



淮扬文化研究文库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SHITONG BEFORE QING DYNASTY

清前《史通》学研究



王嘉川◇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 淮扬文化研究文库 ·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SHITONG BEFORE QING DYNASTY

清前《史通》学研究

王嘉川◇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前《史通》学研究/王嘉川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8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4864 - 0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史学理论 - 中国 - 唐代 ②《史通》- 研究 IV. ①K092.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7266 号

·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

清前《史通》学研究

著 者 / 王嘉川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王 绯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李兰生

责任校对 / 王海荣 李有江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864 - 0

定 价 / 98.00 元

印 张 / 28.8

字 数 / 549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文化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作为软实力日益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程度是与其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更体现在文化发展水平，这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地理人文空间因素的日益重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出现了区域化研究的趋势。21 世纪以来，区域文化的研究与开发较以往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锐利的前进态势，围绕各大区域文化进行的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也不断深入进步。从理论与现实角度考察，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要实现区域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区域文化的优势，挖掘区域文化的资源。

江苏历来是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之地。21 世纪以来，为发扬优秀区域文化精髓，建设文化强省，促进全省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江苏省人民政府制定了《江苏省 2001 ~ 2010 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江苏省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以及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流派，要在加强研究、保护的基础上继承创新，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在此思想指导下，江苏各地纷纷提出建设文化大市、文化强市的目标，学术界率先行动，出版了一批区域文化研究的论著，江苏省教育厅则及时地批准成立了扬州大学“淮

扬文化研究中心”等一批区域文化研究的重点基地，以推进区域文化的研究和深入发展。

江苏高校林立，各大学因其所处的具体地域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也归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特定的区域文化始终对大学的文化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大学所负载的学术、文化与社会责任也日益被推上了更高层次的战略平台。因此，研究、挖掘、整合区域文化使之与大学文化有机地融合，不仅对推动区域文化研究与发展，提高区域文化软实力、构建区域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大学吸取特定区域文化精髓的过程，对创建大学自身的特色文化氛围、凝炼大学精神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所缺乏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大学不是一所好大学；同样，一所没有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的大学也绝非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大学。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说过：“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镇，大学的文化、反世俗陈规的生活方式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常常成为刺激周边社区的载体，同时也是他们赖以骄傲的源泉。”

扬州大学所处的苏中地区，是淮扬文化的核心区之一。作为淮扬文化区域唯一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扬州大学具有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显著特点。学校集中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精干力量，发挥融通互补、协同作战的优势，继承发扬以任中敏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对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区域文化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挖掘整理其丰厚资源并赋予时代精神，阐扬其独特蕴涵并寻找其与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变革相结合的生长点，以求对地方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江苏省人民政府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对扬州大学进行重点投资建设的基础上，在“十一五”期间对扬州大学继续予以重点资助，主要培植能够体现学科交融、具有明显生长性且预期产生良好经济、社会效益的五大重点学科，其中包括从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凝炼而成的“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重点学科。这一重点学科的凝成体现了将江苏优秀的古代文化与灿烂的现代文明有机交融、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和发扬光大的理念，符合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诸

学科已有的专业背景、研究基础和今后的学科发展和学术追求。该重点学科包括“文学转型与区域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与区域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其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就是以任中敏先生别号命名的《半塘文库》和以区域名称命名的《淮扬文化研究文库》，总计 50 余种学术专著，计 1500 万字。“文库”是“十五”期间“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重点学科研究成果的新发展，汇集了扬州大学众多学者的智慧和学识，体现了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可谓是一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型文化工程。可以期待，“文库”的出版将对当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五个文明”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科学发展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出版之际，我们向始终支持和关心“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重点学科建设的教育部社科司、江苏省教育厅的领导及专家表示衷心感谢，对负责定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诸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丛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扬州大学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
发展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 年 12 月

序

乔治忠

嘉川君新著《清前〈史通〉学研究》即将出版，以书稿相示，邀我撰序。一则欣喜嘉川君近年学业大进，成果卓荦；二则对刘知幾《史通》的历代研讨情况甚感兴趣，遂弁言数语于简端。

唐刘知幾《史通》一书，为中国古代唯一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在中国史学史学科中，向来是十分关注的对象，近世研究论著不断涌现，呈繁盛景象。然而自盛唐时期《史通》面世，历代之评议、研习状况，学界虽有所言而言之甚略，且讹传累累更漫无统系，不为之详尽梳理，《史通》之学终难言成立。惟嘉川君深解此道，于是爬梳旧籍，参核辨析，撰成本书，郁郁乎！曰刘知幾《史通》之功臣、曰“《史通》学”由此而成形，均不为过也！

这部《清前〈史通〉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是将唐、五代、宋、金、元、明等各代学者对《史通》研习、评论的状况，予以总的清理，钩稽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展示了《史通》一书在古代社会发挥的史学作用与文化影响，例如列举了唐代刘肃、李肇、柳璨、苏鹗，宋代僧赞宁、孙何、张唐英、黄庭坚、王十朋、陈藻、章如愚，宋元之际王应麟，金元之际王若虚等众多人士对《史通》的评议，如所引张唐英批驳《史通·惑经》篇的论述有1200多字，极力抨击，指刘知幾为“诬圣人之甚”。又如对王若虚引用《史通》、赞同《史通》、批评《史通》的见解做出综合叙述，指出“王若虚本人也

在自己的治学中，对《史通》的观点和资料多所利用，成为我们后人考察《史通》在明朝流行情况的重要资料”。这些揭示，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亦有裨益，非限于史学史畛域。然若非嘉川君关注于此，更复有几人知之？

嘉川君此书，并非仅仅裒辑资料，对《史通》和评论《史通》的各种见解给予明晰的辨析，是又一亮点。例如在叙述《史通》于唐代至元代被学人著录、阐释、引用、赞同或批判的种种史实后，做出总结性评议，引录傅振伦、金毓黻、程千帆三位名家的论述，随即提出：

……三位先生都没有讲到的是，还有不少人利用了《史通》中的各种资料，这是《史通》本身作为文献史料的价值之体现；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选录了《史通》的篇章，这既是《史通》史料价值的表现，也是它作为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典范的价值之表现。而这两个方面，在明清时期的《史通》学中也有其种种表现。以至我们完全可以说，唐宋时期虽然只是《史通》研究的发轫期，但在许多方面已经奠定了后来继续研究的基础。

这段议论表现了作者思虑的周全、视线的明晰，直至今日，由于古籍的大量佚失，我们研讨唐代以前的史学史，尤其是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政权修史的状况，仍然离不开《史通》中《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等篇提供的资料。因此，《史通》之内含有特别的历史资料，确是其整体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选读《史通》的某些文篇，于今不也是史学研习的良好方法吗？看来学界对《史通》的接受与应用，自古时已然全面展开，这是古今贯通的，作者也正好具备这种通古今的考察方式。

《史通》在明代成为学人关注的热点，被多次校刻，广泛流行，评论也越来越以赞同、称扬和发挥为主流。在嘉川君书中，梳理和叙述的史实也最为丰富。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清理明代《史通》学发展状态时，做出了许多深入的考订与评论。例如对于杨慎的议论，则考证了他误解黄庭坚议论而以己意宣扬引发的正面后果，认为

“杨慎关于黄庭坚的假信息，直接促成了明末王惟俭注释《史通》……以致二十世纪内藤湖南还要引述其说，这可见其影响之大！谁说假信息不能上演真历史呢？”这个言简意赅的评论，表达出考察历史的灵动眼光，包含着治史方法论的蕴义。

明人研治《史通》，已经出现议论纷繁、成果多样的兴盛局面，需要梳理，更需要评论。本书正是在梳理考订史实的同时，也予以周密和系统的评论，其独到见解不胜枚举。如详细考述明代学者陆深对《史通》的校刊、评议和改编之后，即给以学术评价，在列举当今学术界的种种说法后，认为：“陆深《史通会要》在摘录《史通》篇章之时，还把《史通》之后其他学者的一些史学论述选录书中，显示出有所续作的意味。但该书并没有像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会’得《史通》之‘要’，内中大部分并没能将《史通》精华全部采入……陆深的真正目的，是在以《史通》的有关内容，建构自己的史学体系。由这一宗旨来说，《史通会要》未能‘会’得《史通》之‘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本不是他的目的及用心所在。”其余对王惟俭、焦竑、胡应麟等在《史通》学上的作为的评述，无不如此，而且都要将近代以来学者的相关论述引入，综合加以研判。特别是关于胡应麟与《史通》的问题上，还专门撰一“附论”之文，辨析傅振伦先生贬斥胡应麟的议论多有不当。如果说在明代，不少学者已经以研究《史通》为契机展开史学理论的探讨，那么嘉川此书则在考述这种史实之际，把近人、今人的讨论也援引进来，当然更有自己的评论判断。这是本书重于理论性、研讨性的学术特色，其优点不言而喻。

本书评述《史通》在宋代的流传和影响，个别地方有时依据观念、见识的相像，来判定某人某说、某事必受《史通》的启示，则证据似显软弱。前人虽指出后世对于《史通》往往“阴用其言”，但此乃笼统概说，整体上自能成立，即使必有这种现象存在，而具体地指定何人“阴用其言”，愚以为仅可在疑似之间而已，不宜断然判定。再者，本书下限止于明代，清人的议论虽随机有所引述，但毕竟不是设立专章以系统评介，这种断限实为遗憾，愚意作者似应接续撰著，力求更为系统和完整。

嘉川君是我名下第一位研究生，自幼成长于北方慷慨、豪迈之

乡，直爽潇洒，而凛凛然有正义之气。负笈南开，三年间研习中国史学史，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徐元文与〈明史〉纂修》、《胡应麟史学理论初探》，治学信心倍增，为当时硕士研究生中学习成绩极为突出者。硕士学位论文以研究胡应麟的学术成果为题，毕业后到河北大学任教，得著名史学家漆侠先生赏识，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仍继续深入研究胡应麟之学术，亦得漆侠先生特许。从研讨胡应麟的学术成就入手而扩展开来，嘉川君对明代史学、文献学有深刻的学术认识，同时也因师从漆侠先生，对宋史研究颇有造诣。今嘉川君为扬州大学教授，学术成就业已显然，余所寄望者：嘉川可否利用已有的治学根基，将专攻方向回归于中国古代史学史，开拓一块独具优势的研究领地，如宋代史学，如明代史学，如《史通》学史，如古代史学理论史，无不可也，惟嘉川思之择之。言至此而意犹未尽，谨题诗以赠：

七律 题赠嘉川君

南开三载有初功，文采昂扬志气充。
世事随缘多转化，德才并进益丰隆。
山房少室幾研遍，水埠长城一史通。
故壤何当寻佳境，榛芜辟处即芳丛。

前言

本书所要研究的，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所著《史通》自行世后，在唐、五代、宋、金、元、明时期的流传及所受评价的历史。虽然研究《史通》成为一门学问是从明代开始的^①，但明朝以前的相关内容也十分丰富，因此本书就用“《史通》学”一词贯通整个研究范围。具体内容则包括四个方面：《史通》的校刻与流布情况，《史通》所受到的各种褒贬评价情况，《史通》内容被作为研究资料引用情况，《史通》篇章被作为文章选录情况。由于各人治学路向不同，本书并没有完全按照上述四个专题的形式展开论述，而是主要以历史发展的自然演进顺序，以人物为中心，梳理各个时代对《史通》接受的发展脉络，这既可以完整展示有关学者对《史通》的总体接受情况，也可以说明上述四个方面的出现虽有时会有先后不同，但有时也会同期并举，并无先后主次之分。不过，论述之中，有些地方为了集中展示某个方面的内容，适当打乱了时间先后顺序，而有些地方则先按内容性质分类，再按时间先后来论述之处。如此变通处理，无非是想更好地展示本书所要研究和揭示的内容。

《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因而就是从世界史学发展历程来说，《史通》的问世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史学意义。而其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深刻的史学批评，对此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因其实事求是的史学品格，对

^① 杨艳秋：《刘知幾〈史通〉与明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前人史学成就的优劣给予了如实透彻的指陈，笔锋犀利如剑，即使“圣人”孔子也未能避免其指责，因而《史通》甫一脱稿，刘知幾自己就极为担心此书能否被世人接受，“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而事实也果不出作者所料，社会上对《史通》的第一反应是“俗以为愚”，“见者亦互言其短”。^①此后，《史通》又被称为“工诃古人”的“史家申、韩”，不但公开贬斥者大有人在，而且很多人还对其史学理论采取了“阴用其法而阳毁其书”的做法。因此，对《史通》在后世的流传及所受评价情况的研究，也就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表层的感性认识看，《史通》一书在后世的校刻与流传，表明了当时学界对史学理论著作的重视，透露出当时史学兴盛发达、需要宏观理论指导的发展态势；从深层的理性认知来说，各个时代对《史通》这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的内容进行的各种评价、认知与接受的境况，既反映了评论者自身的史学思想，也反映了评论者所处时代的史学理论的发展状况，由此我们或可顺势大致勾勒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从而为我们今天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从《史通》作者个人的角度说，刘知幾虽然“泪尽而继之以血”地担心自己的著作不能被世人接受，但他既不能左右当世之人的喜恶好尚，更不可能看到《史通》在后世的流传及所受评价的情况。在《史通》中，身为史臣的刘知幾多次深切地表达了“书名竹帛”、“以图不朽”^②的愿望，虽然他对自己能否如此不无忧虑，但作为唐代史臣的后继者，五代和宋代的史臣确实没有忘记刘知幾的历史贡献，不但在纪传体的新、旧两部《唐书》中都为他设立了传记，而且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③的编年体《资治通鉴》中，也特别记载了他卒于开元九年这一无关军国大政的

①（唐）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292～293页。

②（唐）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第303页。

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资治通鉴》附录，中华书局，1956，第9607页。

事件，成为《通鉴》全书中“重史臣”之意的代表，实现了他“书名竹帛”、“以图不朽”的愿望。但是，刘知幾最为担心的《史通》是否被后世所接受，其流传状况、境遇又如何的问题，古代学人不是没有讲过，但既很少，又片面偏颇，未能全面展示《史通》在历代的流传及所受评价的情况。因此，就是从刘知幾个人夙愿来说，也应该有这样一部著作，来梳理和研究《史通》在后世的流传及所受评价的情况，以告慰这位世界上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的创作者。

本着这样的思路和考虑，笔者在2002年完成博士学业以后，就有写作本书的打算，后来还和几位研治中国史学史的同门师兄弟讨论过此事，但真正下定决心动手写作，则是2009年年底的事情。当时是以“明清《史通》学研究”为题，申报“扬州大学参照‘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这是江苏省和扬州大学共建项目，要求两年内完成。笔者当时的设计是：先介绍刘知幾与《史通》的基本情况，然后是唐宋元时期的《史通》学，再就是明代《史通》学，最后是清代《史通》学。这样一来，《史通》一书自问世后在中国古代的流传及所受评价的情况就全都包括在内了，因此课题虽名为“明清《史通》学研究”，但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史通》学研究”。

笔者当时囿于成说，想当然地认为唐宋元时期的内容不多；又觉得明清部分好像也不是很复杂，所以就没着急写作。可是紧跟着来了其他任务，而且是必须首先完成，于是本课题就又拖了一年，直到2011年10月。待到写完唐宋元部分后发现，已经远远突破了当初对这一部分想当然的认识，而明清两代各自有关材料都比这部分还要丰富得多，如果这样写下去，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课题。遂在撰写明朝部分到三分之一篇幅时，决定缩短战线，由原来设计的由唐至清，改为只写清朝以前，清朝部分因所收资料不比明代少，留待日后单独撰写成书。但在写作过程中，又不断发现原来没有见到的更多资料，需要对全部原设章节不断调整补充，于是在原已推迟交稿时间的基础上，又延长了半年。笔者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使先行刊布的本书稿尽可能完善些，但目前拿出来的，好像还是有些急。好在笔者研究此课题的基本思路已经全部展现于本书稿中，这个思路到底行不行，可以通过本书稿的出版而得到学界师友的教益，因此笔者也愿意把它拿出来，向大家请教。

本书第一章是简述刘知幾和《史通》的基本情况，包括刘知幾生平、《史通》的宗旨及主要内容、《史通》的主要观点及后世评价、《史通》在后世的流传等内容。这对研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学者来说，自然是熟而又熟的，但作为本书的必要铺垫却不能没有，因此就在这一章简略叙述。其中对于《史通》的主要观点部分，为能使读者能够脱离《史通》本书即可了解其主要观点，便采取了逐篇摘录原文的形式。

此下是本书的主体。由于明代《史通》学研究的内容相当丰富，如果只列为一章，篇幅未免过大，于是将其分成上、中、下三篇处理。与此相应，明代以前的唐、五代、宋、金、元部分也采取相同的方式，分成上、下两篇进行。

第二章是唐宋元时期《史通》学研究上篇，包括唐朝、五代时期的《史通》学和北宋时期的《史通》学两节，具体内容有：刘肃、李肇对《史通》的认识，皇甫湜与孙樵对《史通》的回应，苏鹗、柳璨对《史通》的批评，五代时期对《史通》的认识，赞宁、孙何与张唐英对《史通》的批评，官修《新唐书》的有关记载，科考策问中反映的《史通》流行情况，黄庭坚对《史通》的推介与吴缜对《史通》的吸收，《资治通鉴》对刘知幾的记载等。这些内容中，柳璨对《史通》的批评，赞宁、孙何与张唐英对《史通》的批评，官修《新唐书》的有关记载，科考策问中反映的《史通》流布情况等四个方面，学术界往往提到，但像本书这样详细展开论述的尚不多见；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学术界提到较少，更无专深论述。这倒不是大家主观上不重视它们，而是由这些内容的客观实际决定的，它们各自分量都比较轻，单独进行专深研究好像并无必要，就算写出文章也不易发表，当然也就不会受到过多重视。不过，要是以《史通》为中心，用发展的观点，把它们前后联系起来考察，其学术史的意义就有所不同了。

第三章是唐宋元时期《史通》学研究下篇，共分三节，具体内容包括：官私书目对《史通》的著录，讲学授徒中所反映的《史通》流行情况，朱熹“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吗，高似孙对《史通》的引证，章如愚的《史通》学，王应麟对《史通》的认识，王若虚对《史通》的利用，唐宋元时期其他学者对《史通》的关注，

最后是对唐宋元时期《史通》学研究的小结和一个附论。其中，以往学者对南宋官、私书目著录《史通》情况的考察，主要是看对《史通》的类别划分，也就是对《史通》性质的认识，很少考察晁公武对《史通》的认识与应用问题。高似孙对《史通》的引证，章如愚的《史通》学，王应麟对《史通》的认识，王若虚对《史通》的利用等四个问题，学界已经有所关注，但像本书这样条分缕析地予以专题详细考察，好像还没有过。讲学授徒中，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学者讲学授徒中所反映的《史通》在南宋的流行情况，好像还没有人进行梳理。至于“朱熹‘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到有人对这一明代记载持怀疑态度，相反，引用此论者倒是仍大有人在，但笔者的研究表明，明朝人说的这句话还不能贸然接受。

在唐宋元时期，除了以上学者对《史通》予以较多关注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史通》也进行了评议和利用，其具体内容既有对刘知幾和《史通》的评论、驳难，也有对《史通》资料的引用和利用，同时也有对《史通》篇章的引录。这些情况出现在不同学者身上，显得比较零散和孤立，而不像前面各节所涉及的学者那样内容较为丰富、意义较为突出，因此本书就把这些情况汇集在一起，单独列为一节，分题叙述。由于这些内容在每位学者身上都表现得零散孤立，单看其中的任何一人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而一向关注者少，但把它们汇合在一起，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一方面，它们正表现出《史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受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广泛关注，它们既如涓涓细流一般，又如江河伏流一般，为专题性、集中性的《史通》研究的蓄势待发，做出了很好的群众性铺垫工作。另一方面，受到广泛关注本身即可证明，《史通》在两宋时期比较流行易得，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看到它、利用它、研究它。如此，则学界公认的《史通》在唐宋时期流传不广的观点，怕也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了。

附论是对石云先生题为《〈史通〉在宋代为何遭冷遇？》的文章进行商榷辨析。笔者原来未曾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因而向来也承认这一学界已经公认的观点，但通过本书的写作，却形成了正好相反的观点。本着学术为公和遵循学术规范的原则，只好对石先生的观

点进行辨析。但笔者的观点能否站得住脚，还是要请学界师友予以评判的。

第四章是明代《史通》学研究上篇，包括何乔新、祝允明与李梦阳的《史通》学，杨慎的《史通》研究，陆深对《史通》的校刻与研究，唐顺之、梁梦龙与卜大有对《史通》篇章的选录，张之象与张鼎思对《史通》的校刻。何乔新、祝允明对《史通》的认识和李梦阳对《史通》史学理论的阐发，是前人较少关注的论题，从笔者所见资料看，他们是明代对《史通》进行评论的最早学人。在他们之后，有杨慎对《史通》的研究，对此，三年前已有学者写出专题研究文章，笔者按照自己的写作思路撰写本节内容，观点虽有相同、相通之处，但作为后来者，也有进一步深入思考之论，较之似有进境。陆深对《史通》的校刻与研究，自然是明代《史通》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因而早有学者进行研究，不过，陆深校刻《史通》的详细情况还是以本书论述最详；对他人为陆深校刻《史通》所作序跋的研究，前贤揭示的比较少；对陆深《史通会要》的梳理及在此基础上所作的评价，笔者也与一些学者迥然有别。唐顺之、梁梦龙与卜大有对《史通》篇章的选录，推动着《史通》在社会上更为广泛地流行，前贤已经注意到梁梦龙与卜大有选编史学篇章的意义，但都没有直接从《史通》的角度来予以关注。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演进顺序来安排前后节次的。在陆深校刻《史通》之后，张之象与张鼎思也各自校刻了一部《史通》，本书对他们校刻的情况做了详细梳理，这些内容应该是超过了前贤所做的工作的。但在二张与陆深之间的几十年内，许多明代学者对《史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关注与研究，为了将明代《史通》校刻的情况予以集中叙述，本书将二张校刻《史通》的情况提前论述，而把其他学者对《史通》进行的关注与研究则置于下篇。

第五章是明代《史通》学研究中篇，内容有二，一是对李维桢和郭孔延《史通评释》的研究，二是对王惟俭《史通训故》的研究。它们也是因为要将明代《史通》校刻的情况予以集中叙述而提前到此中篇的。由于《史通评释》和《史通训故》流传至今，所以学界对这三人都不陌生，但专题研究好像一篇也没有。对李维桢和郭孔延的《史通》评论，目前学界只引录不足十条论述即对他们

全部工作进行评论，这恐怕仅能说明一部分事实，而不能据以论定其整体工作，因为他们二人各自的评论条目至少有一百九十九条。本着这一原则，笔者对二人各自情况进行详细论评，力图全面揭示其《史通》研究的成就。对李维桢、郭孔延合刊本《史通》与郭孔延单独刻本《史通评释》的关系，笔者也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依据就是郭孔延的几处自述，而这恰恰是前贤都没有注意到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李维桢是否真的评论过《史通》，笔者也在前贤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探讨。王惟俭《史通训故》只是对《史通》进行注释，没有评论性内容以显露其史学思想，因而史学史研究者关注不多；本书从其“凡例”入手，对其注释与校勘工作进行详细梳理，并与郭孔延《史通评释》的部分相同注释做出简略对比，既以见二人各自之注释，亦以见二人注释之异同，力图在此基础上作出客观评价。

第六章是明代《史通》学研究下篇，内容包括焦竑对《史通》的赞同与批评，于慎行、詹景凤的《史通》学，胡应麟的《史通》研究，沈国元、周婴的《史通》学，朱明镐与蒋之翘的《史通》学，明代其他学者对《史通》的关注，最后是对明代《史通》学研究的小结。焦竑、于慎行、詹景凤、胡应麟等人的《史通》学，学界已有注意，但并不全面，笔者既是以《史通》为中心展开研究，自然要予以全面揭示。对胡应麟的《史通》研究，笔者过去曾专文探讨，本书在此基础上更为全面细致地展开，并对不同观点进行了商榷辨析。沈国元、周婴、朱明镐与蒋之翘的《史通》学，学界论述较少，本书各有专门研究。明代其他学者对《史通》的关注，撰写思路与第三章中“唐宋元时期其他学者对《史通》的关注”相同，这些内容都是学界少有论及的，但其中确实有很多值得珍视的精到见解；可惜笔者并未能把由唐代至明代的学人文集全部普查，因而这两节内容肯定会有所遗漏。

以上就是本书内容及笔者自己努力方向的简略介绍，至于努力的结果如何，自然要由广大师友、读者来评判。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本书的写作绝非平地而起，而是有前贤的研究基础作参考的。据笔者所见，九十年前，就已有学者对本书论述的主题有所涉及。例如，朱希祖在1922年即曾对明代《史通》版本问题进行过梳理和优劣评